

导 言

本书旨在从现代化及发展研究的新视角，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重新认识和考察美国建国之初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一场大争论，即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种建国方略的争论，以及这场争论对美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现代化研究”是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第一章叙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中美学术界关于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研究状况以及研究这场争论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以往中美学者虽从不同侧面研究了这一在美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却忽略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在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抑汉扬杰’的倾向。因此 将这场争论置于美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重新审视，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仅如此，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的争论在世界各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初创时期带有普遍性，因而以这场争论作为个案研究，以揭示美国现代化初创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国家政策的转变过程，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现代化的内涵是在工业革命推动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但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选择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美国是在殖民地基础上由欧洲移民建立的新国家，这使它的农业社会具有许多早期现代化因素。本书第二章集中分析美国农业社会的早期现代化因素和独立后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从而阐述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历史背景。美国独立之初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与问题，其中发展经济与建设国家成为当时

最紧迫的两位一体的任务。但对此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形成了两种不同主张。

第三章着重论述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种不同建国方略及其形成过程 探讨了其产生的思想理论渊源和社会经济背景。两种建国主张实际上是关于美国未来发展和现代化的两条不同道路。汉密尔顿主张顺应欧洲工商业兴起的潮流,使美国迅速成为工商业强国 杰斐逊则主张避免走发展工商业的道路 使美国长期保持农业国地位。经济发展与国家建构是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关联的两大主题,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不同主张致使他们在联邦体制上的观点也大相径庭 同时 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不同设想使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也存在着歧见。这样 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

第四章叙述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及联邦党与共和党形成与斗争的过程。由于两人集中代表了南北两大政治集团的利益,因此,两人及南北议员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建立。这场斗争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出现并遍及各个领域 但其深厚根源却潜藏于经济之中,并反映了南北两种不同社会发展趋向的冲突。

由于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对各自的政党具有决定性影响,两党在美国建国之初又分别执掌政权,因此两人及两党的争斗对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五章集中论述了在联邦党执政时期 汉密尔顿的政策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在联邦政府成立后的 10 余年中,汉密尔顿政策的实施解决了困扰政府的财政问题 促进了金融业、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以欧洲“拿破仑战争”为契机 美国出现了商业与经济兴盛时期。但由于各种原因 汉密尔顿鼓励制造业的计划在实施中严重受挫 同时 由于其政策偏重于少数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杰斐逊共和党人及其农业阶层的普遍反对,最终导致了联邦党人在政治上

的失势。

第六章论述了共和党执政后政策演变过程及其对这一时期美国发展进程的影响。杰斐逊就任总统后，在经济上一方面采取“节俭”与“放任”政策，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农业和“西进运动”，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和共和政体，促进了政治民主的发展。但“禁运”法案实施后，他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国家独立的重要性，从而逐渐放弃了早年以农业立国的主张。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后，共和党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发生了转变。此时联邦党在政治上虽已基本消亡，但汉密尔顿的政策却为共和党所采纳，两党在政策上逐步合流。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种不同建国的主张实质上是有关美国未来发展的两种不同设想，或者说是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不同道路，二者对美国的早期发展和以后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联邦政府成立到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的 20 余年，是美国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对这一时期乃至后来美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总体上看，汉密尔顿以工商立国的主张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有利于美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但也存在着历史与阶级局限性；相对而言，杰斐逊以农业立国的主张带有保守性，因而后来被迫放弃，但对美国西部农业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仍起了积极推进作用。他对民主政治与共和政体的关注推进了美国政治现代化。总之，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对美国早期发展和现代化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历史的合力。美国建国后的实际发展道路就是在两者的合力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下形成的。

第一章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 研究的新视角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课题。鉴于本书是将现代化方法用于这一老课题研究的新尝试，因而有必要将本书的研究方法先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 现代化研究 历史学派 的形成及其方法

现代化研究是近 30 多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衍生出的新兴学科。促使其形成的基本动因和大背景是战后高科技革命带动的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由第三世界工业化推进的世界现代化第三次大浪潮。^[1]世界经济、政治与各国社会发展的日益一体化与全球化趋向，使以往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学科划分无法适应需要，于是，现代化研究应运而生。

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出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研究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对现代化的解释自然见仁见智，就连现代化的定义也难以达成共识。学者们对现代化的解释众说纷纭，固然有方法上的原因，但也揭示出研究客体本身的复杂性。现代社会是一个无比庞大的巨型体系，作为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的“现代化”，自然也是异常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面前，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看到的现

象和景观也就大不相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认识现代化的真面目，不仅要借助“望远镜”与“显微镜”，而且还要把观察视角放得更宽阔、更远大一些。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及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宏观视角来看，现代化可大致界定为：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经济依次起飞与增长，并带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整体社会变迁，从而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

以此而论，“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用以分析区域性变迁的一般概念和方法，也不是像西方“现代化论”者那样用若干抽象变项构成的超时空分析架构，而是以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为研究客体，旨在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其研究范围在时空上与世界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大体重叠，但同时又着眼当今与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向。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与发展研究是一对相近与相关的概念，并可以互换使用，但二者间仍有明显差别。如果说发展研究更侧重研究客体的现实和未来趋向以及有关的个案研究，以期得出某些带决策性与运作性的结论，那么，现代化研究更侧重研究客体的整体发展过程，以揭示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现代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它既回顾过去，面对现在，又面向未来，是对整个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宏大领域。

显而易见，现代化研究作为代表国际学术界最新发展方向的领域，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中极富活力和前途的学科增长点。它不但使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契合，使之与中国及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更加贴近，而且使社会科学自身也在发生新的分化与整合，给老的人文学科注入新的活力。以历史学为例，现代化研究使其特有的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的方法大有用武之地，以至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学派，出现了 C. E. 布莱克、巴林顿·摩尔等卓

有成就和蜚声国际学术界的著名学者。^[2]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在研究世界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方面亦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3]这表明,以现代化的新视角重新研究历史,不但可以从更深层次上揭示现代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规律,而且可以使历史学更充分地发挥其知古通今的功能。这对目前处于“危机”中的历史学科,不啻是开辟了一条柳暗花明的希望之路。

以现代化的视角研究历史是史学方法上的重要创新,也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重大突破。首先,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重考据、轻分析,重史料、轻归纳,重微观研究、轻宏观研究的倾向,也有助于改变以往历史研究中以某种立论或观点套用和裁剪历史的现象,还有助于改变目前历史研究中国别史研究相互隔绝、世界史实际上成为国别史组合的状况。在现代化研究的总体框架中,史与论、宏观与微观、国别史与世界史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正如世界现代化的客观进程把地球上的国度第一次联成一个整体世界一样,现代化历史研究也将使世界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其次,在现代化的全新课题下,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大为扩展。在史学史上,一个新的历史观的提出必定要以新材料为支持,也必然促使更新和更多历史资料的发掘。这样,以前被忽略的事件和领域被重视和开拓,以往研究过的课题和结论被重新估价和认识,必将使历史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最后,现代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不但能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更多地被引入历史研究领域,而且将有助于探索把数学、电子计算机信息和模拟技术等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新途径。现代化研究的宏大课题也迫使历史学必须改变以往个体式研究的传统方法,加强学者和学科之间的横向结合与协同研究,这不仅将推动历史学的变革,而且也将使整个社会科学在与自然科学新的融通与整合中产生质的飞跃。

当然 目前以现代化的方法研究历史虽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尚处在探索阶段,研究方法还很不成熟,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简单化倾向。目前存在的通病是:研究者往往将匆忙构筑的体系或架构硬加在历史之上 实际上是用‘现代化’的标签粘贴历史。由于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其新颖结论往往出自主观推导,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另外,研究者多偏重现代化因素和变量的分析,而忽视体现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这样,原本生动活泼的现代化过程变成了只见物不见人的干巴巴的过程。这种将历史高度抽象化的做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忘记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制约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归根结底要通过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不仅如此,历史人物的能动作用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历史的进程和面貌,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左右政府政策的风云人物对一国发展方向往往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为历史与现实经验反复证明。

以上的研究偏向在一个新学科建立之初尽管不可避免,但无疑成为影响学科发展的障碍。为了将目前的研究推向深入,当务之急并非在研究方法上一味求新,而是应强调在吸收和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并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各种新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发掘和占有新的资料,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和考察影响各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实,这种“论从史出”的做法并非新方法,不过是以往崇尚信史的学者所尊崇的历史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历史研究领域真正贯彻上述原则却并不容易,需要花费相当大的气力和付出十分艰辛的努力。

本书选择美国现代化初期联邦政府中关于发展道路的一场大争论,来具体地考察美国现代化的早期发展过程,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作为个案研究 (Case Study) 主要出于下述考虑 首先 农业立

国与工业立国之争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早期的还是后来的现代化国家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在现代化初期几乎都发生过类似的争论，尽管争论的形式不尽相同。因此，研究这场发生在美国的争论，对正在向现代化转变的第三世界国家仍有着现实和借鉴意义。其次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历来是美国史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围绕两人之争的是非曲直 美国史学家也一直在展开争论。因此 以现代化的新视角来研究这一老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研究的来龙去脉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此时独立后的美国正面临着如何建国与发展的问題。华盛顿第一届政府组成后不久，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便与国务卿杰斐逊因政府的大政方针产生分歧。争论由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引发，随即扩及宪法、政体和外交领域。内政外交政策的严重分歧使两人的矛盾终不可调和 并使国会分裂成尖锐对立的兩派 最终导致了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建立。可见 这场争论已不仅仅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个人之争 而是由两人之争引发并以他们为核心的两大集团的争斗。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所言：“这两个伟人之争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人之争，因为它关系着美国的过去与未来。”^[4]正因如此 美国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历来十分关注 有关的著作和文献资料卷帙浩繁。

然而，尽管几乎所有美国历史学派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都不惜倾注笔墨 但是早期学派的著述却对此避而不谈。这与当时历史著述浓厚的功能主义倾向有关。在乔治·班克罗夫特和摩西·沃伦等人看来 历史的特定目的和功能是“训导人民尤其是青

年人的公共与个人道德”^[5] 因此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这种有损国家与政府形象的事件，他们在著述中尽量加以回避。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新一代“史学家”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呼声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当时的学者普遍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因此，这时的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叙述这一事件的。有关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第一部专著的作者鲍尔斯便认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实质上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独立战争只是完成了美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但“革命尚未终结直至 20 年后，才最终决定革命所要建立的不仅是共和制，而且是民主共和制，这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真正的问题所在”^[6]。

十九世纪末，有少数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这场争论的经济背景。有美国第一位社会史学家之称的亨利·亚当斯在《杰斐逊与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等书中，第一次分析了杰斐逊的经济主张，认为他“像其他弗吉尼亚人一样，不主张鼓励制造业和把人们集中在城市，想使美国成为像中国一样的国家。汉密尔顿则与之相反极力主张推进制造业”^[7]。“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中的边疆》中，也指出了杰斐逊民主与边疆农业的关系。他认为：“从美国拓荒时起，边疆地区就对民主产生着影响，杰斐逊把分散的民主力量集中起来，他的民主有农业基础。”^[8]

亨利·亚当斯和特纳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史学的新变化，这与来自欧洲的史学影响有关，与美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更有内在的联系。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美国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由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和以比尔德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反映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史学的新潮流，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查尔斯·比尔德继《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之后又写了《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继续采用集体传

记式的历史调查方法，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经济根源进行分析。他认为两者的斗争反映了“土地和制造业集团、资本主义与农业的对立”。汉密尔顿的政策“大体上是与农业对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些政策构成了明显的交易，由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支持政府，政府则采取尽量增进其利益的政策来作为回报”^[9]。与此同时，维农·帕林顿从思想史的角度，也得出了与比尔德大体相同的结论，认为两者之争“至少可以部分地肯定为魁奈与斯密、农业与资本主义的冲突”^[10]。

比尔德等“进步学派”史学家的著作影响美国史学达 40 年之久。此间研究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学者大都受到了比尔德观点的影响。直至五十年代，“进步学派”的统治地位才被动摇。美国史学中长期存在的“抑汉扬杰”的倾向也有所改变。例如理查德·莫里斯充分肯定了汉密尔顿的历史功绩，指出：“汉密尔顿想使美国成为伟大的工业巨人。”^[11]路易斯·哈克也认为“汉密尔顿的全部计划是为在美国建立资本主义企业”^[12]。杰斐逊则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落后农业经济的代表。理查德·霍夫斯塔得认为“杰斐逊主张的农业是‘非商业、非货币、自给自足农业的反映’”^[13]。

然而，六十年代初，新左派历史学家威廉·威廉斯对汉密尔顿是资本主义代言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汉密尔顿不过是重商主义的传人。尽管他有一个关于制造业的著名计划，但从未把制造业作为经济的一个内在部分加以推动，而杰斐逊既不是重农主义的不变信徒，也不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他的毕生事业可看作是一个重农主义者用重商主义的手段去实现封建的乌托邦”^[14]。威廉斯的上述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例如布罗德·米切尔也认为“汉密尔顿是重商主义的传人”，“他被错误地看作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信徒”^[15]。但是，六十年代中期“新史学”诸派的兴起，使这一争论未能深入下去。由于“新史学”更注重对思想、文化、经济及社会史的研究，更注重对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及以往被忽视的历史

事件的研究，像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这样重大课题反而受到冷落 出版的著作明显减少。

八十年代以来 随着美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反思 特别是对伯纳德·贝林为首的“共和修正派”关于美国革命思想来源观点的质疑，有关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1967年 贝林在其成名之作《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一书中指出，洛克的思想在独立前的北美并非占统治地位，杰斐逊等美国革命者主要受了英国反对派的思想影响，而这些思想不过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一脉相承的“古典共和思想”。贝林的观点得到戈登·伍德、J. G. A. 波科克等人的支持，他们进一步论证，英国反对派“乡绅党”(Country Party)对杰斐逊共和党人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博林伯罗克在反对“宫廷党”(Court Party)斗争中提出的反对腐败、银行和常备军的主张是他们的直接思想来源；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则直接继承了“宫廷党”的衣钵。波科尔进而明确指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是英国“宫廷党”与“乡绅党”斗争的继续。于是，一些学者认为杰斐逊的共和党像“英国的乡绅党一样把过去而不是未来理想化，他们害怕巨变，特别是大的经济变迁，并且无视向更新和更现代的商业社会转变的必然性”^[16]。

乔伊斯·阿普尔比针锋相对地提出“自由派说”她反对将英国“宫廷党”与“乡绅党”斗争的模式套用于美国历史中 特别反对把杰斐逊视为反现代、反对经济变革的“乡绅党”的继承者。她指出 如果把杰斐逊看作“古典共和派”那么怎么解释其执政后自由主义的迅猛发展，具有前现代思想的人难道不主张建立前现代社会？她认为，美国早在殖民地时便开始了政治现代化过程，出现了激进个人主义、乐观物质主义和现实利益政治的趋势，杰斐逊及共和党始终代表了这一新的历史趋势。因此，杰斐逊不是“在与现代性对抗中的失败者，而是在政府如何服务于公民的斗争中的胜利者”^[17]。

有的学者试图从中调和两派的观点，兰西·班宁认为“共和修正派”虽然正确指出了英国反对派对美国第一次党争的影响，但却过分强调了杰斐逊思想的古典成分，低估了其历史进步性。阿普尔比的“自由派说”虽对此做了有益的纠正，但对杰斐逊的评价却有过头之处。班宁认为两派观点的对立除了因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史学研究的方法造成的。由于历史学的分支越来越精细，研究课题越来越狭窄，以至造成有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宏观研究与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微观研究之间的脱节，并使历史学家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斗争置于美国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对两者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这样才有助于消除学者们因各持一端所产生的争执。^[18]

以上是美国史学界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研究的基本状况。至于我国史学界，虽然长期以来在一些论著中对这一课题早就有所论及，^[19]但迄今尚缺乏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在对两人的评价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亦存在着“抑汉扬杰”的倾向，对汉密尔顿的评价不够公允和实事求是。近年来这一倾向已有所改变。在中国美国历史学会第六届年会上，有的学者认为对汉密尔顿及其经济思想应重新评价。在英国工业革命已进行之际，他提出发展美国的制造业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应予以充分肯定。近年来，在新出版的一些美国史著作中，对两人的评价已有所改变。例如，杨生茂与陆镜生著的《美国史新编》指出：“汉密尔顿提倡发展工业的主张是有预见性的，是符合美国历史发展趋势的”；“从历史潮流上看，杰斐逊是保守的。”²⁰以上这些观点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

综上所述，在以往历史研究中，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这些研究虽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但所作的解释却又都不能令人十分信服和满意。以鲍尔斯

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角度将这场争论看作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因袭了杰斐逊本人的说法。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并非是反民主的专制主义者。比尔德从经济角度提出问题，实则是用类似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政治冲突背后的经济根源，从而深化了对这场争论本质的认识。然而，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他的经济解释过分拘泥于统计资料反映的实际和眼前利益，反而把各种因素错综交织的斗争过程简单化了。波科克等“共和修正派”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反对派对美国政治家的思想影响，从而丰富了对这场斗争思想渊源的认识，但将英国政党冲突的模式套用于美国的政党斗争，却显然是牵强的和非历史的。

透过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争论的细枝末节，将其置于美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并非一般性政策争论，也不仅仅是个人与派别之争，而是关系到美国建国后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争论。两位美国开国元勋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国道路，汉密尔顿着眼于世界大势，主张效仿英国走“工商立国”之路，杰斐逊则强调美国的独特性，力主走“农业立国”的道路。这两条建国道路的斗争构成了两人及两党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和亨利·康玛杰指出的那样，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可以“概括为美国过去是怎样一个国家及其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21]。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一重要问题在以往美国历史研究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美国史研究中，“现代化”一词越来越成为频繁出现的术语，现代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历史学者的关注，并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学者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定义却各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因此，在研究美国的现代化之前，应首先探讨美国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否则，现代化就不免成为一个模糊概念，如此研究历史是学术上的大忌。

三 美国现代化与国家发展政策的前瞻

从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看 现代化已经历了三次大浪潮。美国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浪潮中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与后发展国（Late Comer）相比 它是现代化先行国 但与英国等赶上现代化头班车的国家（First Comer）相比，它又是后来者。这使美国现代化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 再加上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美国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各国有很大的不同。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启动 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内源性现代化，即靠社会自身原始现代化因素的积累和创新形成的现代化 以英国最为典型 另一种为外源或传播性现代化 即在外界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引发的现代化，以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最为典型。而美国是在北美荒原上建立的新国家 在移民过程中 英国原始现代化的诸因素也随之在北美衍生 另一方面 作为在北美荒原上开拓出的新国家，这一历史起点又使它的现代化既具有巨大的传导性 又具有巨大的创新性 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突出特点 如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同步发展 工业与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 以及较早出现的世俗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倾向等等，都与此有关联。

美国现代化启始于何时？又经历了哪些阶段？这是目前研究中颇有争议的问题。产生争论的原因之一是 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很难划定一个确切的启始点 另外 现代化又是一个几乎包罗一切的整体变迁过程，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结论往往相差很大。以现代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社会变迁的定义来衡量 美国的现代化当始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 因为 此时美国不仅已开始引进英国纺织技术 从而迈出了工业化的最初步骤，而且随着联邦政府的建立，国家机器开始形成和加强。

这样，启动现代化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已经具备。但是，由于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北部和沿海地区，从总体上看，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推进则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而现代化完成的界标当划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此时，美国已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亨利·康玛杰认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尽管一开始还看不清楚，但过半个世纪后其轮廓便一目了然了。他写道：“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内的事务，至少在理智上遵守十七、十八世纪承袭下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原则”¹⁶；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22]

以上述时间标志划线，可以把美国现代化分为三大时期：一、从 1750 年前后到 1790 年左右，为现代化的酝酿时期；二、从 1790 年到 1890 年，为现代化的转变时期；三、从 1890 年到 1960 年前后，为现代化的成熟时期。应该指出，这一划分还是粗线条的，只是为了较清晰地展现美国现代化的大体轮廓，实际上，每个大的时期还可以再细划出若干阶段；另外，从动态上看，现代化也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就是在现代化成熟后也还会有更高的发展阶段。自从贝尔提出“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之后，西方学者开始用“后现代社会”的词语来称谓当代美国社会。但美国现代社会究竟走向何处，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和经验材料的证实。

如上所述，美国是在南北战争后全面推进工业化，进而步入现代化社会的。但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则始于建国之初。从联邦政府成立到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是美国确立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不但工业化的方针得以基本确立，而且，政治制度和联邦体制的基石以及社会发展的基调也初步形成。汉密尔顿与杰斐逊有关建国道路的争论对这一时期乃至后来美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这场争论有助于探寻美国现代化的起

源。

从上述新视角来重新研究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不但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美国早期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这场争论的起因与本质的认识，而且还能克服长期以来中美史学界在研究上不同程度的‘抑汉扬杰’倾向。这一史学偏向的出现与以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工商立国’的政策顺应了当时美国发展的历史潮流，有利于美国实现工业化和走向现代化而杰斐逊‘农业立国’的设想则带有保守性，因不切实际后来被迫改变和放弃。因此对汉密尔顿的历史功绩应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在纠正以往偏向的同时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对杰斐逊所起的积极历史作用还应予以充分肯定。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发生在美国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和工业化启动时期，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和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各种复杂矛盾和社会冲突。两人在争论中提出或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因此研究这场争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的过程，为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钥匙，但现代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不可能穷尽。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目前仍然是初步的，留有許多空白领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实证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

“发展研究”是二战后才逐渐衍生的新兴学科，其研究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问题。但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却并非始于当代。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便开始探求国富民强的道路。如果说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以及重农学派的学说还是以较为粗俗的形式提出的

早期发展理论和政策 那么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则以颇为完备的形式系统提出了古典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对当时西欧各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无疑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然 他们的政策主要还是根据美国建国时面临的问题提出来的。

在十八世纪末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 面临着许多与后来发展中国家相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汉密尔顿在与杰斐逊争论中提出的许多政策 后来又被一再提出的缘故 也是为什么这些政策对李斯特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原因。因此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 作为最早的发展政策之争 对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早期国家政策的演变，也有理论意义。

但是，十八世纪欧美国家的发展政策与后来特别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政策有显著不同。在战后兴起的世界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中，“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开打出的旗帜和竞相追求的目标 甚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制订政策都有明确的发展纲领 计划以及完备的指标体系 在十八世纪末 不仅上述这些是根本谈不上的 而且就连“发展”这一概念都还未最终形成。在国家政府职能尚未高度分化的情况下，经济、政治与对外政策往往是混为一体的。因此 当时政府的发展政策还是一种“模糊政策”。例如 本书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经济政策概括为“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不过是就其实质而言 事实上 他们从未明确使用过此种词语。尽管如此，上述词语表达的思想内容又是确凿无疑地存在着的。

后人研究前人的历史 困难之一在于，一方面要以前人未有的认识水平去论述他们虽然做了但并未认识或并未充分认识的 事务 另一方面又不能任意拔高前人的思想 将后人的观点强加于前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是将研究客体置于其具体历史条件中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氛围中论述和阐释。这既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本书力求遵循的历史主义方法。